

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大研究途徑－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比較分析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Major Perspectives - Economic Nationalism,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Marxism –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曾怡仁 *Dzeng, Yi-Ren*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國際政治經濟學自一九七〇年代發展以來，關於該新興學科的定位一直存在著爭議。一般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國際關係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交叉綜合學科，主要是探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國際政治與國內經濟、以及國際經濟與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關係是如何互動以及該如何互動，基本上有三大研究途徑，包括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觀點，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試圖比較此三大學派各自從國際關

係學與政治經濟學汲取哪些思想與研究方法。經由這樣的整理思考，不僅可以了解三大學派觀點的異同，也可以幫助釐清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學或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競合與差異所在。最後本文建議，將近來國家學成果帶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當中，對於這門新學科的掌握是會有幫助的。

Since 1970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has caused some debates about the essence of this new discipline.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of IPE is to combine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Economy, and to investig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omestic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domestic politics. Basically, there are three major perspectives—Economic Nationalism,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Marxism—on studying these interac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mpare how different perspective has absorbed concept or research method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Political Economy respectively. Through this comparative study we may distinguish differences or similarities among the IP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nd of this stud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theory of state ma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關鍵詞：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Keywords: Economic Nationalism, Economic Liberalism, Marx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壹、前言

一般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係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交叉綜合學科，是在國際層次上探討政治與經濟因素，或者說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然而這種關係如何互動？何者為因？何者是果？或者這種關係該如何運作才是好的，才是被期待的？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與主張。目前最廣為人們引用的是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分類法，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處理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包括經濟民族主義（或稱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種分類和許多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的劃分歸類雷同。¹然而吉爾平的想法除了來自於傳統的國際關係學之外，主要還參考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遺產。²如果細究可以發現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之間還是有些差別的：其一，前者的研究對象關注於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國際政治與國內經濟或者國際經濟與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後者則主要是以國際政治議題為主，如軍事、安全、外交與國際聯盟等等；其二，兩者的思想淵源也不盡相同，例如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源自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與馬基維里等人的思想，雖然從霍布斯與馬基維里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其處理政治與經濟互動關係的論述，但這議題並非他們主要關注的焦點；相對地，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民族主義則是直接承繼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與美國政治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的重商主義思想。又例如，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思想源頭是格

¹ 吉爾平在其《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1987》一書中，就花了一章的篇幅討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見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2.

² 政治經濟學又可分為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新政治經濟學，前者是探討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包括經濟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而後者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人類在政治市場的政治行為或政治制度，包括理性選擇與新制度主義理論。

勞秀斯 (Hugo Grotius)、洛克 (John Locke) 和康德 (Immanuel Kant) 和威爾遜等人，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則更重視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與李嘉圖的貿易比較利益原則，以及延伸發展的貿易和平理論。相較之下，馬克思主義的脈絡較一致，其國際關係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同樣可以追溯至馬克思 (Karl Marx) 與恩格斯 (F. Engeles) 的世界歷史、殖民主義與亞細亞生產方式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等理論，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列寧 (Valdimir Ilich Lenin)、希法亭 (R. Hilferding)、布哈林 (N. Bukharin) 與盧森堡 (R. Luxemburg) 等古典帝國主義的觀點。主要的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從來就未將政治與經濟，或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分開研究。

以下各節將依序討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學派，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分別從傳統國際關係學以及政治經濟學中汲取哪些思想養分。從這樣的思考與整理過程當中，不僅可以了解三大學派觀點的異同，也可以幫助釐清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傳統國際關係學或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競合與差異所在。最後，本文建議將近來國家學研究成果帶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當中，對於這門新學科的掌握是有幫助的。

貳、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

一、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一)、古典現實主義

二次戰後由於冷戰的接連發生，這樣的現實情境直接反映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在美國從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代這段期間，古典現實主義一直是居於主流的地位。古典現實主義的思想根源可說是淵源流長，從古希臘思想家修昔氏德、十六世紀義大利城邦國家的策士馬基維里、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十八世紀德國思想家黑格爾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十九世紀德國學者韋伯 (Max Weber)、一直到晚近的卡爾

(Edward H. Carr)、尼布爾(Reinhold Neibuhr)、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楠(George Kennan)、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以及艾隆(Raymond Aron)等人，都曾經從不同的議題面向，如權力本質、國家利益、國家生存、人性觀點、以及道德問題等等，來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提出分析。古典現實主義一開始是以批判二次戰前的理想主義而出現的，和其形成鮮明的對比。

理想主義認為人性無關善或惡，根本的問題是人所處的環境，因而可以通過客觀環境的改變或教育來改造人性，使人類不斷進步和往文明的方向發展。³也正因為對人性持這種樂觀的態度，所以理想主義建議經由建立國際組織、國際法規範或者形塑公眾輿論等制度環境的改變，來將人性導向追求集體安全與和平。各國之間縱使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存在利益的矛盾衝突，卻是可以被調和以避免戰爭的發生。⁴可以看出，理想主義的整體思想體系是以人性的可塑性為出發點來推延發展，這也是其和採用霍布斯式人性觀的古典現實主義，最主要的差別所在。⁵

當然，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們的觀點不盡相同，其中莫根索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莫氏提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包括：1、政治是受到人性客觀法則的支配（人性本惡），由於這些法則是無法改變的，因此為了社會的不斷完善，需要了解和掌握社會賴以生存的人性法則；2、以權力來定義利益，國家利益的具體表現即是權力的提高。雖然各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不盡相同，國家之間是戰是和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都離不開以權力界定利益這個原則；3、國家生存是國家最低限度的對外政策目標，國家生存和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甚至是一體的兩面。一旦生存利益獲得確保後，國家才可能追求

³ Lowes Dickinson,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War* (London, 1929), pp. 16 and 22.

⁴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8-59.

⁵ 比較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異同，可以從對人性的不同看法出發來理解，如理想主義的人性可塑性、古典現實主義的人性本惡、新現實主義的理性自利行為者、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有限理性以及建構主義的實踐理性等等。

比較次要的利益；4、抽象的、普世的道德原則不能作為國家的政策指導，採取成功的政治行動本身就是基於國家生存的道德原則；5、現實主義學者或決策者不應將國家目標放在建構普遍的道德秩序上，事實上，每個國家依據國家利益而非道德原則來決定外交政策將使國際關係更具可預測性；6、政治行為只能用政治標準衡量，以權力定義利益可以使國際政治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而能區別於經濟學、倫理學或法律學等其他學科。⁶總之，莫根索的現實主義核心概念就是權力，對於權力的競逐是國際政治的「鐵律」。

作為主流論述的現實主義難免受到其他觀點或學派的批判，其最常受到的批評包括：

1、古典現實主義以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國際政治經驗作為論述基礎，同時硬將內政與外交研究分開，並不符合當今的國際現實。特別是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除了國家之外，還有超國家行為者（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次國家行為者（如地方政府）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如跨國公司與非政府組織），同樣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⁷

2、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政治行為的主要動機，卻從來沒有將權力的定義明確地概念化，除了軍事力量之外，是否也包括經濟甚至意識形態的領導力量，並沒有一致的看法。事實上，權力的大小往往取決於它所要達成的政策目標，權力在不同的議題領域分配狀況也可能不同。例如，美國在軍事安全議題領域擁有絕對的權力優勢，但在經濟領域則遭到日本及歐盟越來越多的挑戰。而在人權、環保及對外援助等議題，北歐國家的發言比美國更受到尊重。此外，權力的展現還牽涉到主觀的行使意願問題。例如，二次戰前美國的國家力量已經超過原來的霸權國－英國，然而由於其不願意承擔霸權國的領導責任，導致後來國際政治經濟的失序，包括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國際經濟危機，

⁶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 4-15.

⁷ 可以參見 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2000, 3rd).

以及法西斯的擴張，而最終付出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同樣地，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史翠菊（Susan Strange）亦認為，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美國不願意繼續承擔霸權國的責任，才導致國際布列頓森林貨幣體系（Bre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原本以美元為核心的固定匯率制度轉為浮動匯率，造成當時國際經濟秩序的不穩定，以及歐美國家面臨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困境。⁸

3、古典現實主義被認為並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它只是建議外交決策者從某種角度來觀察國際事務。例如，沃爾茲就認為莫根索提出的一些理論碎片，並無多大的理論，而且也把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闡述混為一談。⁹當然，這種質疑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因素。事實上，包括莫根索在內的許多古典現實主義者，都是二次大戰期間為了躲避德國納粹的迫害，而移民至美國的歐洲猶太學者或外交官，其國際關係研究深受歐洲史學與哲學思想傳統的薰陶，不像自然科學或經濟學那麼有系統性，而國破家亡的親身體驗，也自然地使他們強調國家中心主義的權力政治分析。此外，美國從戰前原本的不干涉主義傳統，經由參戰，到戰後取得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領導權，這樣的過程並非是基於其立國精神或國家的發展目標。如何應付這樣突如其來的轉變，對於外交決策者而言可說是措手不及，因而急需學者提供簡單明瞭的國際秩序治理之道。上述莫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從中歸納出六大基本原則就是一明顯的代表例子。

上述批評當然有幾分道理，然而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的價值。雖然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國際與國內事務間的分野漸趨模糊，許多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事務中也扮演較過去重要的角色，這些都是事實。然而主權國家在當今國際社會仍是最主要的行為者，這是無庸置疑的，以國家間整合最具成效的歐盟來看，其主要是立基於主權獨立的會員國（特別

⁸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Reply to Miner and Sny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1, (Autumn 1987), pp. 751-752.

⁹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1990.

是德國、法國及英國等大國)彼此間相互承認與支持的結果。甚至,國際非政府組織—世界銀行—的總裁任命,如前任的伍夫維茲(曾任美國副國防部長)和現任的佐立克(曾任美國副助理國務卿),都是經由美國這個霸權國家的選派。國際政治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無法擺脫大國的權力遊戲(power game)。

此外,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僅是提供一種外交政策的參考觀點,反而是外交決策者常需要將其內容簡化以方便快捷決策。如前所述,古典現實主義由於受到歐陸哲學與史學傳統的影響,其理論內涵是深邃豐富的,討論的是人性、國家利益、權力、外交與道德這些因素之間的複雜關係。¹⁰古典現實主義本來就不是採用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其旨趣不在於對未來作準確的預測,而是希望經由哲學思辯中得到啓示,從歷史經驗中得到教訓。正如學者湯普森(Kenneth Thompson)所言,國際政治的決策者必須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敏感的歷史觀,並且以人的哲學思想作為理解國際和國內政治的起點,而這正是古典現實主義的價值所在。¹¹

(二)、新現實主義

古典現實主義自莫根索之後,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雖然在五〇、六〇年代遭到科學行為主義從方法論上批判其未能建立系統性的理論,爾後在六〇、七〇年代也一度遭到新自由主義(包括新功能主義、跨國關係研究以及複合互賴理論)的挑戰,然而在沃爾茲(Kenneth Waltz)那裡由於形成了更嚴謹的簡約系統性理論,以及前蘇聯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質事件的影響,美蘇間進入一種新的冷戰階段,使得現實主義從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支配性地位得以繼續維持,並以一種融合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研究方法的面貌出現,即為後來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¹²

¹⁰ 莫根索的學生湯普森(Kenneth W. Thompson)就認為其老師的思想是一種“國際關係的哲學”,見 Kenneth W. Thompson,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8.

¹¹ Kenneth Thomps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An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6 and 13.

¹² 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t,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gm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552.

雖然古典現實主義與沃爾茲的新(結構)現實主義之核心概念同為權力，並且也都認為國家是理性的合一整體，會去追求客觀存在的國家利益，但前者是從人性本惡的假說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來說明國家之間如何基於人性而進行權力的鬥爭；¹³而後者則是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出發，將焦點放在國家間的互動如何形成國際體系結構，而體系結構中的權力分配又如何反過來制約了國家的對外行為。¹⁴

其次，古典現實主義對國家間戰爭與和平行為有諸多不同的看法，國際體系只是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其他還包括權力平衡、國際公法與國際道德、以及領導者智慧等等；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是影響國家行為的唯一重要因素，而且該國際體系並不是由哪個個別國家或政治人物有意識或有目的建構形成的，並且一旦形成以後也不受其控制，而是可以自主的運作。¹⁵

再次，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追求的目的，權力就是利益，一國參與國際社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獲取權力，並且權力首先意指的是軍事實力；而新現實主義則強調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有效手段，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是安全與生存，而且從結構觀點來理解權力應是指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不限於軍事力量。

最後，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古典現實主義著重歸納方法，主要借助於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而新現實主義較偏重演繹的方法，並且主要吸收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結構—公司行為」的觀念和分析方式，來說明國際體系結構和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關係。¹⁶不論公司負責人的人格特質或公司的組織形式，

¹³ 一般認為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包括，沃爾茲為代表的結構現實主義以及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本文主要是討論前者，因其可說是國關研究中的主流觀點。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此書中的新現實主義一詞也是指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

¹⁴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79.

¹⁵ *Ibid.*, 80.

¹⁶ 同註9.

不同的市場結構，如完全競爭市場、寡占市場與壟斷市場，對於理性自利的公司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制約作用。同樣地，新現實主義也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比國家領導人或國家的政治結構屬性對於國家對外行為的解釋較有系統性與效力。並且如同市場看不見的手所形成的價格體系一樣，國際體系一旦建立就具有自身的結構和力量，不是體系內的個體在短期內所能加以改變。

如同古典現實主義一樣，作為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新現實主義也遭到不同學派的質疑：

1、對國家中心主義觀點的批判。新現實主義主張將國際關係研究放在體系層次分析，認為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結構制約了國家的對外行為，而國家是國際體系裡最重要的行為者，並且是理性合一的社會實體（the unitary state），會去追求客觀存在於體系的國家利益。¹⁷這不僅意味著國家對外行為是沒有能動性的，而且國家享有相對於國內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其對外決策不會受到國內不同階級或利益團體的壓力影響。對此，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國家僅是替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保證人，因而並不存在抽象客觀的國家利益。官僚決策模式則是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國家並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而是由一群理性自利的官僚組成，其對外決策時會受到官僚本位和官僚本身利益的考量影響，並不一定對國家利益有清楚的共識。¹⁸同時，國家對外決策時也常無法掌握到所有的資訊，可能是依循過去的經驗做判斷，因而頂多是一種「有限理性」的漸進決策過程。總之，由於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作用，因而將國家本質與國內因素排除於研究範疇之外，形成沒有「國家」研究的國家中心主義論述。國家僅被設想為不論領土的大小或採行甚麼樣的政治制度，它的功能都是一樣的，都想確保自己的安全生存。事實上，國家的對外行為往往是同時受到國際體系與國內社會結構兩個

¹⁷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2-45.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June 1985, p. 294.

¹⁸ John G. Ikenberry,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1), pp. 12-13, 1988.

層面因素的影響，將國際與國內因素截然劃分，雖然有助於形成獨立的系統性理論，然而操作分析時卻也必須承擔可能與事實脫節的風險。

2、新現實主義強調的是國際體系的「結構 (structure)」研究，而忽略體系的「進程 (process)」作用。也就是說，新現實主義關心的是體系結構如何制約國家的對外行為，而不在意國與國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問題，國家被視為扮演相同自助功能的等質單位，國家間的互動僅是一再地複製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難以擺脫衝突或戰爭的宿命。針對於此，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關係進程是指國際體系單位 (國家) 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在體系結構沒有發生變化的情形下，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如此，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並不等於無秩序，國與國之間仍能透過建立國際組織、國際體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或慣例，來改變或調整國家的行為以進行合作。¹⁹

3、對新現實主義來說，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而建構主義者則認為，無政府狀態並不是國際體系固有的東西，而是行為者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建構的社會狀態，是彼此間相互主觀的共識產物。也就是說，無政府性是一種文化觀念的結構，而不是物質性的客觀存在。²⁰如此，無政府性可以因著理念以及國家間互動關係的改變而改變，國家間就不僅只能是處於敵對關係的霍布斯狀態，而是可以建構契約合作關係的洛克文化，或者友誼和平關係的康德文化，以避免衝突或戰爭的發生。²¹

二、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也稱為重商主義或國家主義，在

¹⁹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3.

²⁰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81.

²¹ 參閱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般主流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被看作是一種過時的，甚至是錯誤的經濟理論，這種認識在當前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支持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更形深刻。然而經濟民族主義或重商主義真的是過時錯誤的觀點嗎？經濟學家熊彼特就感慨地說，人們對於重商主義的偏見是始於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事實上，重商主義作為近代經濟學的起點，研究國家干預市場的前驅，以及最早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進行研究的學說，必有其可取之處。²²更何況西歐國家的早期發展，或今日新興工業化國家推行現代化，均實行不等程度或不同方式的重商主義政策。就是號稱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的凱恩斯也不諱言，他的理論也是吸收和借鏡重商主義的理論。因而對於何謂重商主義，實有重新加以認識的必要。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經濟民族主義的發展至今主要可以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包括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的古典重商主義，或稱商業重商主義時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後進國家所實行的工業重商主義時期；六、七〇年代以來日本及東亞四小龍國家領導經濟發展的新重商主義，拉丁美洲國家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實施的經濟民族主義時期；以及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

（一）、古典或商業重商主義時期。自從十五世紀開始，歐洲商業資本的興起、新航路的發現、國家機器（透由官僚化與國王壟斷軍隊）的強大發展、以及國家之間戰爭頻繁軍費需求大增等等因素的影響，促使了重商主義的興起，也加速瓦解了傳統的封建社會。古典（商業）重商主義時期可再細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即大約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中葉之間的早期重商主義，與十六世紀下半至十七世紀中葉的晚期重商主義時期。早期重商主義主張國家通過海上商業貿易活動和地理的擴張來取得財富，當時主要是以金銀財寶或貨幣的存量為衡量標準，為了減少金銀或貨幣流出國外，做法上國家應該嚴格控制貿易活動，以行政手段鼓勵出口而妨礙進口以保證國際收支的順差。到了晚期的重

²²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0.

商主義階段，由於國際市場已經形成，使得擴大對外貿易成爲可能。因而比起前期，國家較允許貨幣輸出國外以購買外國商品，但必須保持商品輸出大於輸入。爲達此目的，國家積極鼓勵能銷售其產品至國外的工場手工業發展。簡言之，早期重商主義是以調節貨幣的運動，而晚期重商主義則是以調節貿易商品運動，來達到國家財富積累的目標。

重商主義思想到了十八世紀中葉遭到了以亞當斯密爲首的自由主義學者抨擊，認爲國家財富的累積不在於金銀等貴重金屬或貨幣的輸入，貨幣的作用僅在於作爲價值尺度與交易的流通媒介，其本身並不能增加財富，財富應該是繫於土地與勞動的年生產物，特別是取決於勞動分工的勞動生產力提升。斯密同時反對以國家干預貿易的手段，來調節貨幣的流入與輸出，在他看來，可以依據供給與需求這支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自行調解，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只會扭曲市場機能，並不能達到國富的目標。除此之外，當時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英國已成爲世界的霸權國家，一時之間重商主義似乎也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二)、工業重商主義時期。到了十九世紀初前後，重商主義又以一種經過改造的面貌出現，美國政治家漢密爾頓以及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兩人主要是從國家安全角度以及國家發展的後進性情境，來論述貿易保護主義的必要性，特別是對國內工業發展的保護。

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儘管在政治上實現了獨立，但在經濟上依然沒有改變殖民時期形成的基本結構，農業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工業產品仍需仰賴進口。同時，對外貿易主要還是依賴英國市場，這種貿易結構限制了美國的真正獨立。²³很自然地，美國開國一些先輩均具備經濟民族主義的思想，以求解決此困境，其中漢密爾頓的主張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漢密爾頓強調國際關係中強權政治的本質是，每個獨立的國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來促使本國利益的實現。他主張把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年輕美利堅國的生存和發展聯繫在一起，因爲經濟活動與國家的生存是息息相關的。由於國家生存依賴於擁有一切必須的供

²³ Edmund S. Morgan, "The Puritan Eth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4, No. 1, January 1967, p. 37.

應品，因而實行某種形式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是需要考量的。特別是設置關稅壁壘可以使美國幼稚工業免遭歐洲成熟工業的競爭，這是新共和國建立和發展製造業的前提條件，這種想法不久也影響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²⁴

李斯特不僅從政治還從經濟上，並且更是科學地闡述其重商主義思想，形成了和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相抗衡的國家經濟學說。首先，李斯特批評亞當斯密的國際貿易絕對比較利益原則是一種短視與靜態的觀點，忽視了長期的與動態的比較利益或國家利益的考量。其次，李斯特認為亞當斯密以漠視國家發展的差異性來研究適合於全體人類社會利益的問題，是一種錯誤的普世主義觀點。事實上，每個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致的，政治經濟學要以歷史為依據，借鑑各國發展的具體經驗與教訓。²⁵例如普魯士直到一八七〇年代才完成德國的統一進行工業化發展，如果國家不給於適當的扶持，實行具體的保護政策，其工業產品是無法和先進國家競爭的，自由貿易只適合優先發展並有競爭力的國家。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後進國—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所推廣的「富國強兵」政策。這也可說明為何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派思想，在日本受到重視的原因。再次，和自由主義不同，在李斯特看來國家於整個生產活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生產力不僅是關於創造物質價值的人類勞動，也應包括維持法律與秩序、培養和促進教育、科學、宗教以及藝術等等人的精神勞動生產力，而這一切均需要國家積極的介入。也可以說，國家的財富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家的精神財富。最後，和商業重商主義不同，李斯特認為工業生產才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工業對於個人、社會與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²⁶因此國家應該以關稅來保護幼稚工業的發展，這是一種工業重商主義的主張。²⁷值得注意的是，

²⁴ Virgle Glenn Wilhite, *Found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8), p. 229.

²⁵ 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照譯，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第 109 頁。

²⁶ 同上註，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五章。

²⁷ 同上註，第二十六章及第二十七章。

李斯特並非一味地支持保護主義，而是認為一旦工業發展趕上先進國家的水平以後，就應該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三）、新重商主義時期。日本及東亞四小龍在六、七〇年代以後飛躍發展背後的理念，可以說受到李斯特思想的影響很深。這個階段和前面兩個階段的的不同點，並不僅是消極地以各種關稅障礙對外國進口產品設限，而是以產業政策、匯率政策、國營企業上游產品、公營銀行優惠貸款和國家研究單位的技術轉移等多元手段，來積極地鼓勵發展重點產業以及出口，以擴大國際貿易市場的佔有比率，賺取外匯。國家思考的並不是廠商短期的利潤效率，而是國家長期的整體生產效能。同時在勞資關係方面，除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社會和諧的價值外，也實行排除勞工力量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政經體制安排。簡言之，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並不是如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僅扮演追隨市場（follow market）或補充市場不足的角色，而是一種領導市場（lead market）的「發展導向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²⁸

同一時期拉丁美洲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實施另一種形式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策略。爲了擺脫西方核心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支配，拉美國家採行一系列強化國家在經濟領域干預的作法，包括實施自給自足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沒收外國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國有化”運動；以及爲了抗衡外部壓力與擴大市場活力，成立拉美自由貿易協會和中美洲共同市場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較爲特殊的是，除了上述的改革措施之外，共同的語言、心理和文化特點，再加上反美情緒，賦予拉丁美洲經濟民族主義在現代化發展中的內在統一力量。

（四）、全球化下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八〇年代以後全球化快速進展，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日深，合作有其必要性。然而世界資源的相對有限性

²⁸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使得各國在合作中可能伴隨著衝突。例如，雖然絕大部分國家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繼續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但多數國家仍然採用各種方式來保護國內市場。以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其常使用非關稅障礙，如技術限制、勞工權益保護標準和綠色壁壘等等方式，來排除其他後進國家以傷害勞工和環保為代價的低成本商品進口。一些發達國家也可能通過經濟制裁與經濟封鎖的方式，來威脅打開他國的市場，美國"301 條款"的頻頻使用就是鮮明的例證。西方先進國家還可能透過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建立和維護，來推行有利於本國或國家集團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後進國家而言，由於市場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所引起的國家主權削弱現象，為了使本國經濟不至於過度依賴外部環境，國家也常會採取某種形式的保護民族工業措施來減少損失。

除此之外，除非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往全球主義方向發展，否則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發展可以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一種當代表現形式，於區域合作的框架下民族國家可以追求原本單一國家所不能獨自實現的目標，甚至排斥區域外的國家競爭以追求國家利益。可以看到，隨著八〇年代中期以來歐洲一體化的進展及其帶來的經濟利益，美國的政策傾向也開始從傳統的多邊主義轉向地區主義。美國於一九九四年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及積極的參與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可以視為是其面對歐洲一體化挑戰的回應。

總結上述各個階段的重商主義主張，雖然不能發現一種系統性或延續性的理論體系，但還是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第一、重商主義的內涵並非一成不變的，不僅僅是重視商業交易活動而已。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演進，其主張也從單純追求金銀或貨幣的存量，改為鼓勵商品貿易出口與扶持幼稚工業發展，以及近來從總體考量如何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等等不同的做法。第二、重商主義並非完全反對自由貿易，並不是和自由主義截然的對立，而是認為國家的產品有了國際競爭力之後，再開放國內的市場，因為自由貿易常是有益於商品具競爭力的國家。第三、鼓勵發展本國工業，不僅工業具有溢

出效應會導致總體經濟的發展，而且工業產品能夠基本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如此才可避免因依賴他國而影響國家的經濟安全與政治上的獨立，更不用說工業技術的發展在現代世界是軍事力量的基礎與國家安全的核心。

如果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思想運用至國際政治經濟研究，則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主張：

第一、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論是考量國家（經濟）安全或經濟發展，均是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中最主要的行為主體。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越來越多的超國家行為者、次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包括國際經貿組織、跨國公司、地方政府與 NGO 等等）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只要國際社會仍處於無中央權威的狀態，國家仍是追求利益的最主要行為者，這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或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作為分析的主要研究對象不同。

第二、國家被當作是一個一元的主體，有其自身存在的目的性，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權力對國家來說既是目的又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此外，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既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加總，也不能完全化約為階級利益，對外它參與和其他主權國家的競爭，對內則被認為力圖實現社會中大部分人的利益。這明顯不同於自由主義將國家視為補充市場不足或失靈的工具，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將國家視為替市民社會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兩者均否認有所謂客觀存在的國家利益。

第三、在無中央政府權威的國際社會裡，國家被視為是一個理性自利的行為者，會從成本-收益法則來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行為。過去認為國家間的經貿交流活動是一種零和的遊戲（zero-sum game），某一個國家的獲得就是以其他國家的損失為前提，因而國家對外行為的思考依據是「相對利得（relative interest）」而非「絕對利得（absolute interest）」。²⁹近來雖不再堅持零和遊戲的概念，但仍會注意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以及如何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等問題。

第四、國家間為了經濟資源而進行的鬥爭是國際體系本身的內在特質，

²⁹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 10

因此國家間的每一場衝突都同時具有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性質。³⁰從長期來看，權力和財富是互補的，財富是權力行使的基本要素，而權力是獲取並保持財富的必要手段，兩者缺一不可以自行，這和自由主義將「大砲與奶油」之間的選擇看成是一種權衡關係不同。

第五、國際關係權力分配格局或國際政治結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關係的基礎。這和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後者主張國際經濟關係是基礎結構，制約了上層國際政治結構的運作，並且國際經濟關係主要是反映國內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性與擴張性，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基本上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參、自由主義國際理論與經濟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比起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自由主義內部的派別更是龐雜，包括格勞秀斯的理性主義(後來發展為英國學派)、美國前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義、康德(Immanuel Kant)的共和自由主義、密特蘭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義、哈斯(Ernst Hass)的新功能主義、基歐漢與奈伊的跨國主義及複合互賴理論、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全球治理理論等等。雖然各派別之間的思想淵源及主要內容不見得完全相同，大體而言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可以包括如下幾點：

(一)、否定霍布斯式現實主義關於人性本惡的預設認為，國家是自利、不信任與殘暴的，如此必然導致國家間的衝突或戰爭。相反地，自由主義國際理論不是接受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關於人性本善的觀點，就是認為縱使人性無關善惡也是可以加以教化的，或者會基於理性思考來追求私利。經由人民的交往或對民眾的教化，可以形成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從而

³⁰ Frederic S. Pearson and Simon Payasl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9), p. 34.

在根本上杜絕戰爭的根源。³¹例如，康德主張人類理性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最終會使國家之間的關係從霍布斯式的戰爭狀態過渡到法制狀態，從而時實現“永久和平”的目標。威爾遜也認為人類的本性無所謂的善或惡，不過教育和宣傳的力量可以克服人類無知與愚昧的天性，避免獨裁者利用這個弱點來實現自己的野心。至於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國家作為理性的行為主體，縱使在霸權衰退以後，基於成本效益的計算，仍會繼續支持霸權過去所創立的國際體制，以降低國家間互動的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或擺脫囚徒困境以利合作。

（二）、反對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是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狀態，是一種無秩序的狀態。自由主義基於洛克的主張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民的自然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受到自然法則的約束與保護，而不是處於無序的狀態。準此，自由主義認為國際社會雖然好似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最高的權力當局，但存有理性的交往紐帶和共同規範，對外政策的目的應是加強這種交往和規範，削弱乃至消除國際關係中違背理性的衝突因素。格勞秀斯就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並非就是無序的混亂狀態，國家之間可以選擇外交折衝、設定國際法規範或權力平衡的佈局等方式，來維持國際秩序。同樣地，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認為，可以依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來追求集體的安全。而八〇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則主張，國家之間可以經由建立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來進行合作。

（三）、相對於現實主義所採行的歷史循環主義，自由主義則是持一種進步的歷史觀。古典現實主義從人性本惡的預設類推，認為戰爭是國際社會不可避免的本質。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特性會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而國家間的互動又再一次複製了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而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則認為，國際關係史其實就是一部霸權的興衰史，人類歷史所顯現的就是霸權的循環週期。也就是說，現實主義不論從人性、無政府性還是霸權週期興衰的角度出發，其所採行的是歷史循環主義的史觀，人類難以擺脫戰

³¹ Lowes Dickinson,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War* (London, 1929), pp. 16 and 22.

爭、無序或霸權循環的宿命。相對地，自由主義不論主張人性本善或是可以教化的、還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不等於無秩序、或者國家是理性的行為主體等等，都展現出一種對人類前途樂觀的看法，並且是可以加以掌握的進步史觀。

(四)、一些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強調，國際社會除了國家之外還包括其他的行為主體。例如，複合互賴理論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Theory) 主張超國家行為者 (如國際經貿組織、跨國公司)、次國家行為者 (如地方政府) 以及非國家行為者 (如 NGOs) 等等，均在國際社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隨著冷戰的和緩，自由主義主張軍事力量並非追求國家利益的唯一有效手段，而且國際事務並不存在階層式的優先次序，經貿、環保與人權等議題的重要性並不下於軍事安全議題。然而複合互賴理論的重點並不是在於貶低國家的角色，而是特別強調應從不同的議題領域來理解權力的運作 (issue-area power)，以取代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所採行的總體權力 (general power) 觀點。

二、經濟自由主義

上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非國家行為者的強調、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相對自主運作以及理性自利的行為體假設，也都可以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和其他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觀點中找到淵源。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自由主義有兩個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即經濟的可分離性與經濟的優先性。前者主張市場作為自我調節的制度出現在人類經濟生活以來，人們需求的滿足主要是建立在自願交換的契約上，而不再如同過去氏族、部落或封建社會，依循的是與家長或首領的親疏血緣關係或社會階層身分，來決定該生產什麼以及可以消費什麼。經濟自由主義同時依據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的觀點，認為供給可以創造需求，供給與需求之間是平衡的，買方或賣方個人的經濟活動或許可能失敗，但市場作為一個總體體系是不會失靈的。此外，經濟自由主義還認為，公共利益是所有私人追求各自利益的副產品，並不存在超脫個人之上的抽象公共利益，透過看不見的手的機制可以將私人利益與

公共利益協調完善。簡言之，經濟自由主義從自我需求滿足體系、供給與需求之間平衡以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協調等三個主要面向，來論證市場可以從家庭或政治權威分離出來獨自運作，並且是有效率地滿足人類的經濟生活需求，這即是經濟的可分離性要義。正因為如此，政府就應該尊重看不見的手，扮演小（或夜警）政府的角色，僅承擔提供教育、國防、司法裁判與基礎建設等公共財的責任即可。³²也就是說，和前述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張經濟是服務政治的手段不同，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僅是補充市場不足的工具，經濟活動本身就是目的，這就是經濟的優先性精義。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複雜化，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已從先前古典時期的簡單手工業或商業交易活動的生產方式，進入大規模工業生產與銀行資本結合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隨之出現的就是公共財、外部性與獨占或寡占等市場失靈的現象，這些正是此時興起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公共財指的是某些產品由於具有共享性（某人的使用並不會減少其他人使用的機會）與不可排他性（某人的使用並不能排除其他人使用）的性質，如燈塔、港口、道路與橋樑等等，難以要求使用者付費而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導致市場缺乏提供該類產品的經濟誘因，而需要由國家來提供。外部性是指由於價格機能不能有效的傳達訊息，導致買賣雙方當事人無需對交易以外第三者所受到的傷害（如工廠排放黑煙或廢水影響附近居民健康）付出成本，造成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不協調的社會成本問題，進而扭曲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利用。解決這種外部性問題可以採用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補償、罰款、提撥回饋金、污染配額與勒令歇業等等。然而不論選擇何種方式解決，總是政治性的決定，是各種政治力量與利益團體協商的結果。此外，由於激烈的產品與價格競爭，大企業仗著優勢的資金、技術與市場行銷能力，可能會併吞中小企業，而形成寡占或獨占。而另有一些產業的本身特質就可能造成

³²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54頁。

成一般人或後來者進入市場的困難度，如需要龐大資金的產業（如金融或航太業），或隨著消費者人數增多，平均成本負擔反而會遞減的產業（如瓦斯或電訊業對於管線的鋪設成本），亦就是自然獨占或寡占的情形。針對這兩種形式的獨占或寡占都需仰賴國家處理，如制定反托拉斯法或管制產品價格，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如果說公共財、外部性與獨占或寡占等是屬於市場局部失靈的問題，那麼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所呈現的就是一種需求不足的市場整體性失靈。針對此問題凱恩斯主張有效需求才能決定供給，而不是如先前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供給創造需求，供需之間必然均衡。在凱恩斯的論述基礎上，當今國家的經濟職能就是作總體經濟需求的管理，國家可以採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外貿政策與增加公共投資等方式來解決投資或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以合理化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可以看見，不論是新古典經濟學或凱恩斯學派，同樣都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主張的經濟可分離性有其侷限性，市場不可能脫離國家而運作。然而另一方面，兩者仍將國家視為能有效處理市場失靈的工具，市場活動本身才是目的，這正是包括古典、新古典以及凱恩斯學派等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傳的核心主張。

相較於古典、新古典以及凱恩斯經濟學將國家視為輔助市場運作的有效工具，七〇年代以來在經濟自由主義脈絡發展的理性（公共）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認為，政府不能被假設為一個會自然促進經濟發展和為全民謀福利的實體，政府本身就是由一群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官僚組成，常會和主要的利益團體合作進行尋租行為（*rent seeking*）。如此，政府介入市場活動不見得可以補充市場的不足，反而可能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理性選擇理論針對此政府可能失靈的現象，主張經濟運作還是尊重看不見的手這個機制最有效率，政府不應該輕易的介入市場。正因為如此的主張小政府，理性選擇理論被歸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簡言之，古典、新古典與凱恩斯經濟學指出政府可以介入市場的時機條件，而理性選擇理論則是更直接的表明政府介入市場可能造成的傷害。

經濟自由主義關於國際經濟的主張就是依循比較利益原則（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利益”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加以修正後的“相對比較利益”原則。如前所述，亞當斯密反對重商主義認為國家財富的累積是建立在單純的貨幣持有量與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口，而應是在於國內生產力的提昇，特別是基於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勞動生產力提升上面。將此觀點推廣至國際經濟層面，亞當斯密主張在某一產品的生產上，一國所耗費的勞動成本絕對低於另一個國家，那麼在生產效率上就佔有絕對的優勢，如果各國都生產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然後再進行交換，那麼各國就都可以獲得絕對的好處。³³基於此，不應像重商主義那樣不加以分析，就限制外國比國內較擅長生產的東西進口，這種做法對於本國也不見得有利。

然而在李嘉圖看來，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利益原則要達到國與國之間經濟活動互通有無，並且兩蒙其利的理想狀態，乃是基於一個前提假設，即進行貿易的每一個國家均必須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李嘉圖質疑認為，假如一個國家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佔有優勢，而另一個國家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均處於相對劣勢，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具優勢的國家要生產所有的產品，而處於劣勢的國家就不能發展貿易？如此就不會產生國際經濟交流活動。針對此問題，李嘉圖修正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利益原則”，提出自己所謂的“相對比較利益原則”。也就是說，縱使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相比，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於相對劣勢，但在國內各產業之間或不同商品的生產成本之間，總有相對較佔優勢的產業或商品，該國就可以集中生產和其他國家相比劣勢較小的產品以供出口。相對地，在所有產品生產上均佔優勢的國家，只需生產自己國內優勢最大的產品出口即可。³⁴李嘉圖認為依循此“相對比較利益原則”，即使一國和另一國相比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均處於劣勢，國際分工與貿易仍然可能發生，並且對交易雙方都有利。這種僅從國家內部思考自己利得是否增加，而不

³³ 同上註，第 28-29 頁。

³⁴ Daniel R. Fusfeld, *The Age of the Economist*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pp. 43-44.

計較每一次經濟交流是否交易對手國會獲益更多，正是往後經濟自由主義在國際層面上的核心主張—以「絕對利得 (absolute gain)」取代「相對利得 (relative gain)」，並可延伸如下觀點：

(一)、經濟自由主義認為世界市場能夠提供後進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日本及東亞四小龍過去的成功經驗就是顯著的例子。雖然這些國家二次戰後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依賴美國的市場，甚至是接受美國的經濟或軍事援助，但由於六〇年代以後相繼實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策略，面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終究能夠創造經濟奇蹟。過程中或許有勞工剝削或環境破壞的問題，然而東亞國家的成就和過去一些實行進口替代自給自足發展策略的拉丁美洲國家，或實行社會主義式經濟計畫的國家，形成鮮明的對比。³⁵

(二)、只要每一個國家遵循相對比較利益原則從事經濟生產與國際貿易活動，縱使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有快慢先後之別，但終究都能往發展的方向邁進。屬於經濟自由主義的雁形理論就認為，基於生產要素成本而形成的東亞分工體系，由日本、經東亞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與韓國）、東亞新四小龍（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與越南，就是依循此原則形成分工生產鏈而先後成功發展的例證。

(三)、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假使國家經濟利益的追求或人民部分日常生活所需，須仰賴其他國家的合作或供給，那麼生產分工就有助於國家彼此間相互依賴與和平相處，而不會輕啓戰端。特別是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基於理性的思維活動，每一個消費者或投資廠商都是追求利益極大化的行為者，這種人格特質如果也能擴散到政治領域，以理性代替情感衝動或意識形態來處理國際事務，將可以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經由頻繁的經貿交流活動也有助於彼此間的了解，可以避免誤會衝突而保障和平，貿易和平論、功能主義的「分枝

³⁵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ed.,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ramification)」學說以及新功能主義的「外溢 (spill-over)」觀點，均是這方面的代表性理論。³⁶

可以說，這些觀點主張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國際體系，是當代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並且注重國際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發展對國內政治的可能改造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分析單位與利益歸屬是個人或廠商，國家僅是扮演一個補充市場運作的功能角色。雖然主流的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看到非國家行為者與超國家行為者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但大都仍採行國家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是理性合一的整體，基於成本效益分析，會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裡尋求合作以追求「絕對利得」的最大化。例如，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與國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會經由建立國際體制 (regime) 來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和提高市場的確定性，以創造雙贏互利的局面。此外，如上所述，屬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脈絡的理性選擇理論則認為，國家是由一群追求私利的官僚組成而非鐵板一塊，當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時，特別是經貿政策，相關官僚部門可能會結合國內的階級或利益團體形成社會聯盟，甚至是尋租聯盟，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如此看來，到底所謂的「絕對利得」是指國家、官僚、政黨、利益團體或階級的利益，倒是必須進一步探究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包括有奧森 (Mancur Olson) 的集體行動理論，³⁷以及柯瑞維奇 (Peter

³⁶ 功能主義學者米特蘭尼 (David Mitrany) 認為，各國政府面對急速增多、日益繁雜的非政治性、純技術性的事務，將迫使各國政府必須依賴專業人員來處理，其中許多問題之解決又各國合作難以竟其功，國際間各種專業的合作及組織即應運而生，並不斷擴大本身的功能，最後可能會取代政府的若干功能。米特蘭尼並提出「分枝」說，認為某個專業領域的合作會促成另一個專業領域的合作，就如同枝葉分枝一樣不斷地擴大，最後也會滲入政治事務的範圍。這種合作關係的持續延伸，將有助於世界和平的維持。新功能主義者哈斯 (Ernst Haas) 以「溢出」取代「分枝」的概念認為，各國未具份量的專業人士，往往人微言輕無助於整合的進行，反而由各國官僚體系中的專家共同致力整合，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同時整合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溢回」的現象。

³⁷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Gourevitch)、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和羅格斯基 (Ronald Rogowski) 等人的社會聯盟范式 (也稱第二意象翻轉理論)。³⁸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競合關係。

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或自由主義關於人性的假設、分析單位、利益歸屬或國家與市場關係等問題的看法均不相同。經濟民族主義以國家作為主要的分析單位, 強調國家是一理性的行為者, 基於本身生存安全的考量, 在必要時甚至可以犧牲個人利益以追求國家利益, 而經濟活動僅是國家為追求生存與發展的手段, 國家本身才是目的。而經濟自由主義則以個人作為主要分析單位與利益的歸屬對象, 個人 (無論是生產者或消費者) 主觀偏好的滿足就是經濟利益的實現, 個人利益的加總等於社會的總體福利, 並沒有另外抽象存在的國家或社會利益。古典經濟學認為國家僅應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期待國家能修補失靈的市場, 不論何者國家都被視為是一個服務全體社會福利的中立行為者。此外, 經濟自由主義依循薩伊定律認為供給可以創造需求, 供需之間因而是平衡的, 透過市場機制這一看不見的手不僅可以提升生產效率, 並且也不會有非志願性的失業存在。

相對地,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才是最重要的分析對象, 階級矛盾和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階級的經濟利益是存在於客觀的生產過程當中, 而非依賴於主觀的偏好能否滿足, 是否握有生產工具才是決定經濟利益能否實現的關鍵。此外, 經濟利益必須與階級意識相結合才能成為階級利益, 並且透過 (資本家

³⁸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8 (2), 1977, pp. 281-313.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的) 國家或(無產階級的) 政黨/革命落實為階級的政治利益, 這樣利益才能得到確切的保障。馬克思主義同時認為國家是屬於上層結構並受下層經濟結構的支配, 國家不可能扮演中立的角色, 而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後來的新馬克思主義雖然不再主張國家僅是資產階級的簡單統治工具, 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以及資本積累的保證人, 並擁有相對於市民社會統治階級的決策自主性。然而新馬克思主義這種修正觀點, 同樣是從經濟功能邏輯來思考國家的本質與職能, 國家並沒有自身存在的目的性。

此外、馬克思主義主張市場不可能是和諧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有著內在的矛盾, 包括利潤率下降、供需失衡生產過剩以及剝削所造成的貧窮化趨向等三大主要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縱使國家也難以調和, 最後將導致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爆發, 以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屆時作為統治階級支配工具的國家將自然萎縮消亡。

然而馬克思在世時, 西歐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爆發其所預期的無產階級革命, 對此列寧提出新的看法加以解釋, 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是一種全球現象。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將會發展成為帝國主義, 不僅掠奪海外殖民地的便宜原料, 剝削其勞工的生產剩餘, 並且將其作為國內剩餘產品的消費市場, 以及過多資金的投資對象, 如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能存在的三大矛盾問題(利潤率下降定律、供需失衡定律以及貧窮化定率) 可以得到暫時的緩解。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彼此之間為了爭奪新的商品市場、原料來源與過剩資金的對外投資出路, 終究會爆發帝國主義彼此間的衝突或戰爭, 屆時被殖民國家的無產階級與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將會聯合起來, 實踐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列寧這樣將馬克思原來關注國內生產過程當中的剝削問題, 轉而強調國與國之間交換過程的剝削, 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國際衝突研究, 無疑對於後來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例如, 弗蘭克(A. G. Frank) 的依附理論就認為, 第三世界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如

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的地位一樣，發達國家的發展必然要以不發達國家的貧窮化為代價，這是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運行的必要條件。³⁹

二、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馬克思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上，雖然後者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動力、擴散以及最終的滅亡作研究，頂多是討論國內的階級政治而非國際政治問題，然而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仍深深的影響後來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例如，二十世紀初以列寧為代表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家（包括盧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都認為，經濟制度的發展對帝國主義的形成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必須用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解釋帝國主義。這和過去從個人的領土野心或追求功名聲望的目的為起點的傳統帝國主義研究，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外，六、七〇年代的依附理論家也把唯物主義擺在突出的位置，認為二次戰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無法發展的主因，不是國內政治或文化因素造成的，而是受制於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的不平等交換關係。事實上，一些批評家往往以是否運用了唯物主義方法論來衡量依附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採用的不是機械的，而是辯證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如果說國際關係學的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或者是國際關係學的自由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不論在思想淵源或者研究的旨趣上是有些差異的話，那麼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就沒有那麼明顯的差別了，甚至兩者是合而為一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過去國際關係學的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都將國際國家體系（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與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capitalist world-system）分開看待，並且主要是集中研究前者，特別是冷戰期間更是如此。相對地，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脈絡裡，國際國家體系的運作是和世界資本

³⁹ Andre.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y Study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Press, 1967) .

主義體系分不開的。有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主張，兩個體系之間是一種單向的因果決定關係，即認為屬於基礎結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制約了上層的國際體系之運作，國際政治僅是反映資本主義的矛盾本質，古典帝國主義與依附理論即持此類看法。另有些學者則認為，兩者之間不是簡單的決定關係，而是雙向的辯證互動關係，即上層的國際體系也可以具有相對的自主性，並且其運作也會反作用於基層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律動，兩者是基於資本積累這一共同的邏輯來聯繫的，這可以蔡斯敦恩（Christopher Chase-Dunn）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為代表。⁴⁰

此外，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主張國際關係研究不能將國內與國際分析層次分開，對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戰爭等等問題的探討，都必須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理解，採行一種「由內而外（inside-out）」的分析取向。很明顯地，這和主流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從外在體系的制約作用來理解國家的對外行為不同，後者是一種「由外而內（outside-in）」的研究方式。總之，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將國內政治、國內經濟、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等四個面向做一整合式的研究。

伍、結論：重新思考國家

當然，國內政治、國內經濟、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四者如何互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過由於國家剛好處於國際體系與國內社會結構的中介角色，對於國家本質與功能的探討，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觀察角度。除此之外，當今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學派，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構主義，也都採用國家中心主義的觀點，因而對於「國家」的理解是避免不了的。也就是說，不論是國際關係學或者國際政治經濟學，都有必要「將國家重新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研究，而這也正符

⁴⁰ George T. Crane and Abb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2.

合七〇年代以來，整個政治學於後行為主義時期的重要發展趨勢之一。

七〇年代以來國家學至少有三個脈絡的發展，包括新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與「國家職能性 (state capacity)」的研究成果；史卡西波 (Theda Skocpol)、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梯利 (Charles Tilly) 與曼 (Michael Mann) 等人的歷史社會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國家理論，試圖將新馬克思主義與韋伯的國家觀點結合；⁴¹以及理性選擇的集體行動與社會聯盟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是一種基於經濟邏輯的思考，主張國家不是資產階級的簡單統治工具，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的保證人，並從中取得相對於統治階級的決策自主性。歷史社會學派則認為，光從經濟邏輯來思考國家自主性問題是不夠的，由於國家處於國際與國內社會的中介角色，並擁有其他組織所沒有的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因而對外負有提供國防安全保障，對內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正是此安全邏輯的理由使得國家擁有了相對於市民社會的自主性。而理性選擇理論則認為，不能將國家視為合一的、利他的實體，而是由一群理性追求私利 (可以是金錢、地位或名望) 的官僚組成，其可能會和社會不同階級或利益團體結成尋租聯盟，進而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毫無疑問，這些不同的國家理論對於理解國際關係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同學派間的觀點或方法論上的差異，是非常有幫助的。

⁴¹ Theda Skocpol, Peter B. Eva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 1992) .;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States in History* ed., by John A. Hall (Cambridge: Blackwell, 1986) .;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1985) .

參考文獻

- Crane, George T. and Abl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ckinson, Lowes. 1929.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War*. London.
- Dougherty, James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1982.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gman Publishing Company.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ank, Andre G.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y Study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Press.
- Frieden, Jeffrey A. and David A. Lake ed., 1990.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reffi, Gary. and Donald L. Wyman, ed., 1987.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urevitch, Peter. 1977.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8. No.2.
- Haggard, Stephe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John G. 1988.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ed., 1978. *Between Powerand Plenty: Foreign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7.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rasner, Stephen.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ichael. 1986.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States in History* ed., by John A. Hall. Cambridge: Blackwell.
- Morgan, Edmund S. 1967. "The Puritan Eth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4. No. 1.
- Morgenthau, Hans J. 1961.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Nye, Joseph and Robert Keohane, 2000.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 in Transition*. 3rd. Little Brown.
-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nald Rogowski, Ronald.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Herbert. 1985.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June 1985.
- Skocpol, Theda. Peter B. Eva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ichael. 1986.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usan. 1987.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Reply to Miner and Sny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1..
- Thompson, Kenneth W. 1960.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 An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0.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hite, Virgle G. 1958. *Found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